

近代报刊与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的兴衰

王天根

摘要:近代政治变革风云变幻,报刊积极参与政治舞台的建制。面对革命派有策略的政治宣传,袁世凯蓄意制造癸丑报灾。此后,袁世凯自以为政治舞台空间无限扩大,政治野心膨胀,竟至远离民意复辟帝制。面对幕府转向军政利益集团的袁记北洋的兴衰有多重解读,报刊舆论为其提供合法性支持或质疑性的批判,无疑是其兴衰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其中的得失利弊尤值得省思。

关键词:袁世凯;幕府;北洋军阀;孙中山;同盟会;报刊史;媒介史

中图分类号:K25;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2-0122-08

作者简介: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安徽合肥 230039)。

近代中国,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结构面临解构,社会与国家有渐次分离的趋势。面对社会与国家各自权限的重新界定,以报刊为核心的大众传媒往往充当政党乃至军政利益集团评判政治变革的工具或手段。面对剧烈的政治变革,近代军政利益集团颇重社会舆论的经营,李鸿章幕府、张之洞幕府等概莫能外,颇有舆论经营意识的袁世凯幕府尤其如此。

袁世凯疏于治学,精于世故。1898年,袁世凯向荣禄告康梁之谋,他因此赢得丰厚的政治回报,于次年出任山东巡抚。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故,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继承李的官位,也继承了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的衣钵。李鸿章病亡仅一月余,梁启超就做了精当的预测:“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惟袁世凯。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至其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之所能言也。而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其人也。”^①袁世凯接受了李

的部分幕宾,诸如杨士骧、杨士琦等人。袁记军政利益集团的文武骨干力量16人中,安徽籍的有8人^②,可见袁记军政利益集团与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有着利缘上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继承了李鸿章幕府的一些传统,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革。袁世凯善于利用亲缘、利缘关系建构其利益集团内在、外在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点与李鸿章利益集团有着一脉相承之处,正如李鸿章利益集团之于曾国藩军政利益集团。袁氏集团尤重视社会形象,袁世凯本人在舆论界也着力颇多。

一、幕府转变成军政利益集团历程中袁世凯等对政治舆论的经营

随着政治思潮的演变,袁世凯幕府在民国前后也转而适应形势的发展,主动放弃一些旧俗而与时俱进,变成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军政利益集团。由此而言,袁记幕府及后来具有现代意义的军政利益集团,开启了北洋军阀之先声。

实际上,袁世凯利益集团的崛起有个过程。

^①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② 分别是段祺瑞(合肥人)、姜桂题(亳县人)、陆建章(蒙城人)、江朝宗(旌德人)、段芝贵(合肥人)、倪嗣冲(阜阳人)、杨士骧(泗州人)、杨士琦(泗州人),参见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01~105页。

就军事而言，袁世凯出使朝鲜，因治兵有方，颇受朝鲜国王的青睐而初现锋芒；小站练兵，仿德军建制及兵法操练，建成新军。袁角逐政坛多依赖军队。与此同时，袁世凯也颇重社会声誉。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他结识报人杭辛斋、严复等，并多有往来。杭辛斋，“浙江人。学识兼优，素以道义为重。清光绪间，主撰北京《中华报》，并与彭翼仲合办《京话日报》，发挥正谊，倡导文明，实为中国新闻学之泰斗。当时袁世凯正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最为西太后所宠幸，辛斋著论常讥讽之”^①。袁世凯结交杭辛斋后，常有聚会，但其交谊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报人与政客的关系。戊戌变法后，由于彭翼仲、杭辛斋主笔的《中华报》大书特书“袁世凯枪决保皇党”，“未几袁世凯借口杭辛斋、彭翼仲同谋煽乱，妨害治安，奏诸朝廷拿交刑部治罪，辛斋与彭君皆被逮，《中华报》、《京话日报》相继查封。彼时袁威权已炽，定欲制辛斋等死命。幸外城警察厅长朱桂莘誓死援救，仅判辛斋徒刑五年，彭君则发往新疆效力赎罪”^②。可见，一旦涉及社会形象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政客对报人绝不手软。

在政治逐利过程中，袁世凯幕府迅速崛起，亦逐步演变成近代意义上的军政利益集团。袁世凯非常注意自己在维新变革中的政治形象。他一方面积极利用报刊，注意经营舆论，1902年首创《北洋官报》，将其树立成全国学习的模范官报。另一方面，他苦心经营新军，并借此开启军人治国的征途。对此，舆论精英严复说：“维新总督如袁、岑辈，自任旋转乾坤……其所行自谓西法。虽然，非西国西法也，乃支那租界之西法。租界西人相聚为法以束缚华人。袁、岑辈则为内地西人，而以西人之待华人者待其

民，峻法严罚，令有必行，而民生之疾苦，物力之凋残，非所恤矣。”^③严复称袁世凯为“内地西人”，讥讽其仿效租界之法治华人，在“民生之疾苦，物力之凋残”中攫取军饷。可见，其时严复对袁世凯作为维新总督的印象并不佳。而袁世凯积极经营舆论，试图扭转自己的负面形象，对报人或拉或打。

丁未政潮前后，面对汪康年主持的《京报》这一反对力量，袁世凯予以惩处^④。面对复杂多变的政局，袁世凯有意识地将自己塑造成强有力的拿破仑式人物^⑤。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1911年11月21日）《浅说画报》^⑥第一页载：“袁世凯家眷来京，袁内阁已于昨日将其眷属接至北京，现又电召其子克定迅速来京，不知有何意见。”次日，《浅说画报》刊载“革命武昌之谈判”：“闻日前袁内阁派蔡廷干赴武昌……黄兴、汤化龙、黎元洪三君，与蔡君共议甚久，黎君甚罕发言，黄、汤二君发议甚畅，蔡君云公等所要求之件，恐转述或有误传之语，请开列条款，俾仆回复，黄、汤二君允之，遂以函授蔡。蔡君已回京，覆袁内阁。闻蔡廷干由武昌带回革命军条件共廿五条，其第一条云清政府必须退让而中国必须成为民主国云。”又载：“袁世凯覆孙抚电，日前山东孙宝琦，电致内阁力主共和政体，已志前报，今闻袁总理覆电云，无论君主民主，德人在旁，请豫防之云云。”可见，袁世凯称政治制度上民主或专制属内政，而德人对华野心属外患，名为制外以安内。实际上，对民主或君主政治制度的选择，袁世凯并没有在报刊上公开明确表态，此见袁氏舆论策略之高明，也见袁记军政利益集团在报刊上对政治问题的骑墙表述。

总而言之，袁记幕府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北

① 王建中：《洪宪惨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页。原铸于1925年，由新新印刷局印刷，京兆商会联合会发行。王建中历任天津北洋政法学堂和济南高等学堂教职，于1915年参与倒袁，所述多为其亲历。该书说袁任直隶总督时“始识辛斋名”，有误。

② 王建中：《洪宪惨史》，第9页。

③ 1903年农历正月严复致熊季廉信，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125页。

④ 参见拙著《清末民初报刊与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参见拙文《政治偶像建构与清末民初报刊表述的政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

⑥ 大英图书馆藏，OBR.99。据该日《浅说画报》所载广告，该报“六页一张”，“每月装订成册”，“大清邮政总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

洋军政利益集团有个过程,报刊政治舆论的呈现也如影随形。北洋派系开启了中国近代军阀林立的时代,“前清末造,袁开府北洋,宪政党人多为北洋幕府所罗致,遂有以北洋为政治中心之主张,报纸宣传,乃有‘北洋派’三字出现”^①。可见,“北洋派”代指军政派系,其概念本身也是传媒塑造的产物。

二、革命派的舆论议程设置与袁世凯统治合法性危机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同盟会及其报刊与袁记军政利益集团发生了摩擦。个中恩怨,林林总总。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3日,袁世凯提议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据居正回忆,“南京参议院通过唐内阁阁员之翌日,政府公宴唐总理于总统府”。席间,蔡元培请唐绍仪加入同盟会,黄兴也起立敦劝,与会者全体鼓掌赞成。居正即离席取同盟会入会愿书,交唐手中。唐颇为踌躇,“考虑移时,即在愿书上签字印可,黄、蔡二先生签作介绍人,孙公签字主盟。唐先生起立宣誓,大众高呼同盟会万岁”^②。唐本为袁世凯心腹,结果被同盟会拉过去,显然触犯袁世凯的政治忌讳。孙中山行迹尤让袁世凯放心不下。

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位置以后,重任同盟会总理。在武昌就任副总统的黎元洪邀请孙中山往鄂共商国是。4月12日早8时,孙中山“往都督府辞行,与黎副总统谈要政甚久。同盟会支部催请,遂偕黎公赴会”。其时对孙中山的武汉之行,舆论界有两种声音。章士钊以记者身份说,“此番鄂人之欢迎前总统孙君,在亲睹其状者,可立决为出于诚意。孙、黎交欢,尤无间言。武昌为东南各省之主盟,得此,真可为吾国前途庆矣”。而“《神州日报》及《民声日报》汉口专电,谓‘孙君在黄鹤楼演说社会革命,次日铜圆局工人,即同盟罢工,鄂中顿见纷

扰’。又谓:‘孙君在汉口演说,听者相顾错愕,无拍掌赞成者。’又谓:‘黎副总统不肯正式承认同盟会协理,孙君……邀黎君……赴同盟、社会各党之茶会,黎君于会场中始终未发一言’”^③。反对舆论称孙中山演说后即有罢工,此为袁世凯后来咒骂孙中山无任何本事、只会捣乱等打下伏笔。

与此同时,原同盟会政治舆论领袖积极利用报刊对袁世凯及其军政利益集团进行议程设置,即有意识地步步为营,加强对袁世凯及其政治合法性的批判。1912年4月18~22日,戴季陶以“天仇”笔名在《民权报》刊发《胆大妄为之袁世凯》,称:“袁世凯乃任其坐拥重兵,肆杀民党,作宗社党之依灵,为外国人之鸱獭,是与借刀杀人何异?”袁世凯的镇压对象包括报刊,“报刊为舆论之机关,言论为天赋之自由,千百志士,洒如许热血,所欲得者此其一也。而袁世凯竟敢以野蛮手段封禁《中华日报》,专制野蛮达极点矣”。针对袁世凯打压不同政见者,《民权报》亦称:“《中华日报》之议论如何,主旨如何,被封之原因如何,电文简略,不能深知。然共和国中,无论如何,皆不得有此举。”对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的喉舌,《民权报》称“咄咄舆论代表之报纸,尚有认仇作父者,吾不知其何心矣”^④。4月19~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系列评论《袁世凯之罪状》,说“任袁世凯之所为,中华民国之根基,将不固矣”,罗列袁世凯六款罪状,第一款就是袁氏并不赞成共和:“近日政府党之人,或民党之软化于政府者,多谓袁氏为共和之功臣,非袁氏则共和难于成立;并谓袁氏出山,即有赞同革命之意。惟吾之所不解者,袁氏入京之时,共和之声,已遍全国,袁氏若欲赞成共和,何必极力主战?且派宵人南来,鼓吹君主立宪,并请人著为英文论说,寄诸美国,谓中国今日之人民程度,即君主立宪,尚觉过早,何况共和。”^⑤比照《浅说画报》评议袁世凯在民主或君主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

①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北洋之起源及其崩溃·直皖秘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页。

② 居正:《梅川日记》,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02页。

③ 居正:《梅川日记》,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第107~109页。

④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⑤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40~341页。

《民权报》可谓一针见血。4月26日，戴季陶又以“天仇”笔名在《民权报》发表《讨袁世凯》，称：“天仇宣布袁世凯罪状已多次矣，计日则袁氏应早见之。当此文发布时，深欲袁之悔悟，而改其所为，以谋国利民福，为共和之保障，故语意间于激烈之中，尤含劝勉之意。孰意袁氏病民病国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并将袁世凯称为“民贼”，是“可杀者”^①。4月28日，戴季陶发表《告北方报界》，称：“北方之言论，殊有不能与全国大势协和者。”“今者，袁氏之专制，事事已见实施，其虐民病国之举，已为天下所共睹，而北方报纸之大多数，但颂其人为善，而不能举其善者为何，亦不能否认反对者之说为不实，徒护一人之权利，博一人之欢心，而人民之痛苦，所不顾焉。……舆论界而袒袁氏，其奈国民之前途何？”^②对北方支持袁世凯的报刊予以警告。

围绕袁世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戴季陶为代表的《民权报》与袁派《民声报》等展开论战。论战的激烈程度从《民权报》刊发戴季陶一人时评的频率即可见一斑。1912年5月2~8日，《民权报》刊发《非民声之〈民声报〉》，称：“袁氏拥权，任用私人，狐群狗党，尽入政界，其行为无异专制君主。全国舆论界，哑然无声。本报所举其违法害理事实，不下数十条，该报若欲为之辩护，请逐条翻案，并列袁氏之善政。若本报条所反对者非事实，则自愿任违法之责。”^③

《民权报》除批驳《民声报》外，对于《神州报》刊发为袁世凯辩护的文章也极其反感。5月9日，《民权报》发表《告〈民声〉〈神州〉两报之最后语》，称：“《民声报》与本报以文辞相辩者，则后已十有余日。其对于本报所主张之原则条件，俱遗其大者远者，然于本题之外，以无

味之词为掩饰。明知袁之非也，而犹曰：袁虽若此，然而其他善政，不能因以磨灭……《民声报》其尚有人心乎？吾深愿其改悔。……《民声报》休矣！”^④5月13日，发表《荒谬绝伦之〈神州报〉》，称：“《神州报》始终欲为袁氏作辩护，于是颠三倒四，发为狂言，而又不稍自省，可怜亦复可笑。对于本报昨日之驳斥，巧撰其说，欲借蒙阅者之眼，特再纠正之。《神州报》记者若稍具人心，即速缄尔口，毋徒以涂抹为文过计也。”警告《神州报》“勿再为此妄辩，而甘为袁氏作俚灵也”^⑤。讨伐袁记《民权报》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5月14日，《民权报》发表《咄咄不可教海之〈民声报〉》，重申：“《民声报》一败再败，本报攻击问难之语，一字不能答，于是三日不敢出声。今日复又强词夺理，于本报论说前后之立言本意，亦不知寻取，而法理则全然不知，更无足论，居然欲助《神州报》为后援，胆大极矣！”《民权报》立论根于袁世凯政治统治有无合法性：“本报攻击袁氏之要点在‘违法’，而推其敢于违法之原因，则在袁氏‘假内阁政治之名，行统领政治之实’，前后二万余言，皆本此意。”对于充当袁记政权喉舌的《民声报》再予警告：“正告《民声报》记者，败兵之将，不足言勇，速改尔之初心，完成尔之人格后，再言其他，不然，人格已坏，难以救药，殆所谓朽木不可雕也。”^⑥

《民权报》及其主笔戴季陶不仅攻击袁世凯，同时连带攻击其时与袁世凯走得较近的章太炎，如1912年5月19日发表《该死的章炳麟》等，次日更发表《杀》，称熊希龄卖国、唐绍仪愚民、袁世凯专横、章炳麟阿权，皆当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⑦这一檄文发表后，戴季陶旋被逮入狱^⑧，但他仍在5月27日的

①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61~362页。

②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63~364页。

③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66~367页。

④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77~378页。

⑤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79~380页。

⑥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80~381页。

⑦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89页。

⑧ 见《民权报》1912年5月24日发表的《五月二十二夜》：“甫提笔续昨稿，忽来狱吏，出拘票以视，且笑且言。票上大书特书‘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捉究’。”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98页。

《民权报》上刊发《袁世凯专横无道》，再从专制层面论述袁世凯的罪状：“袁世凯之罪状已宣布至数十次矣，而袁更进一步，欲干涉参议院之自由，一面则利用《临时约法》，一面则利用党见纷争，至欲解散参议院，另行组织。噫！专制魔王之辣手段，至今更别开生面矣。”^①

《民权报》及戴季陶等一度寄希望速开国会，以争取国民政治的合法性：“袁世凯之违法，参议院不弹劾，以助成专制之淫威。参议院组织既非合法，议员更无代表人民之程度，而人民不速开正式选举，以固共和国之基，坐令专横者自专横，尸位者自尸位，哀哉！”^②此属一部分国民党政治精英的共识，即通过选举和平从袁世凯手中夺权。这从《民权报》1912年5月28日至6月2日刊发的《今日之两大问题》，即“财政问题之解决”、“选举问题之解决”中可窥见一斑。致力选举问题的代表性人物无疑是宋教仁，而宋教仁被杀又成为同盟会与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舆论交锋的焦点。

三、媒介建构的政治表演舞台与袁世凯称帝及其舆论后果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做了种种准备，包括刺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后，舆论精英邵力子连续在《民立报》上刊发时评。他在3月21日的《宋教仁之被狙击》中称：“天地间而果有公道，宋教仁必不死，则主张刺宋教仁者枉自为小人而已。”^③报人杭辛斋民国元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国会开幕，质问宋教仁案、反对违法大借款，杭辛斋均列首衔”^④。与此对应的是袁世凯对舆论界采取了扼杀政策，制造了癸丑报灾。

1914年6月8日，居正以“东辟”笔名在《民国》第一年第二号上刊发《日本最近政变记》，“撮记其最近所表现之事实，以为吾国有志于政治上改革者告焉”。文章称：“言论界之

对于政治上活动者，殆具有左右政府之势力。以视吾国袁政府之用军警干预议会、干涉言论者，相去又何如也！”^⑤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1914年7月9日，黄兴在檀香山与美国记者谈话时称：“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让人民享有和美国公民同样充分的自由。目前中国的情况比满清统治时期更为险恶。民脂民膏被用来压制言论，雇佣刺客，贿赂军队，以消灭那些反对新暴政的人。为了自由，我们将奋斗到底。”在黄兴看来，“袁世凯花钱制造谎言，隐瞒其政府与中国现况的真相，几乎所有外人在华设立的报纸和外国通讯员都有津贴，以致大家无法明了自由在我国被扼杀的情形。而孙先生在世人面前被诬为自私自利、贪赃枉法、卷款潜逃，这些都是谎言。袁世凯更下令制造另一项谎言，说‘白狼’与革命党勾结，掠夺残杀，为革命党谋利。‘白狼’和我们可没有丝毫关系”。7月15日，黄兴对美国《旧金山年报》记者谈话称：“袁世凯继孙逸仙为临时总统后，即有帝制自为的野心。他是利用虚伪的承诺骗取了今日的地位，他用所有的方法来标明重视共和，但却把自己形成绝对独裁的地位。袁世凯是绝对不会成功的。”^⑥针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黄兴等在美国报界乃至舆论界的游说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要前提是取得日本的支持，他为此不惜出卖民族、国家的权益，签订卖国条约。居正以“东辟”笔名于1915年3月前后发表《揭破袁世凯与日本交涉之黑幕》，云：“先是袁氏与早稻田大学总长大隈伯素有交谊，袁氏术得总统，即由伯荐有贺长雄博士为袁氏顾问。有贺氏就聘，即唱政权转移，由清常委任全权，组织共和政府，又唱必须修改约法之议，连篇累牍。同时有早稻田大学教习浮田和民博士，亦引申其说，为之鼓吹（该论见于三年正月《太阳杂志》），袁氏心德之。以为改玉改

①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99页。

②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第399~400页。

③ 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④ 王建中：《洪宪惨史》，第9页。

⑤ 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第140页、143页。

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3~365页。

步，得法律及学说上之依据，天下后世，无有议其非者。……洎大隈伯膺大命组织内阁，袁氏闻之，喜而不寐，其机关报亦大表欢迎。”^①袁世凯相机而动，意在称帝，以报刊为核心的近代中外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但袁世凯在政坛长袖善舞，他早年开办《北洋官报》，后成全国各省官报学习的榜样。昔日《国闻报》的主笔严复不仅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还译著时事评论并汇编成《居览日记》的重要部分，供袁世凯阅览，并常在《公言报》上刊文，为袁派乃至北洋辩护。1915年4月21日，严复说：“至报纸谓日本要求条件，政府逐渐承认，此亦难以过信。至谓英、法、俄三国使臣，转劝吾政府承认要求者，则实无其事。……总之，日来外间谣诼甚多，或谓日劝袁专制，即真为帝；或又谓日将逐袁，恢复帝制，朝夕百变，不可捉摸，大抵皆难深信而已。”^②因世界大战的牵制，西方对华利益复杂多变，日本乘机出兵青岛，表面上是对德宣战，意在取而代之。袁世凯不但袖手旁观，且宣布所谓中立。可见，日本成为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关键性的争取力量，这是问题的核心。与此对应的是，袁世凯在政治合法性上也利用报刊为复辟帝制造舆论。1915年6月19日，严复称：“复向于报章，舍英文报外，不甚寓目，北京诸报，实无一佳，必不得已，《亚细亚报》或稍胜也。”^③《亚细亚报》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帮凶，严复对它的好感可与其列名筹安会等相联系，这涉及语多分歧的政治变局。

而日本利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机缘，对待中国决不手软。继侵占青岛后，日本趁机勒索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条件。这引起了英国的恐慌，京、津外文报刊亦多有报道及评论。1915年5月6日，严复说：“连

日消息颇恶，或闻日本于我已递最后通牒，唯见京、津英文时报，则云：‘该通牒实已到京，然犹未递，因现英外部格来挟同华盛顿政府，正在极力调停，此事沮止，远东现状，或至决裂云云。’此信若确，自是吾人之福。”^④事实上，袁世凯也曾与日本讨价还价，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应对^⑤。但日本不理睬这些，下了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前一天，袁世凯通报称：“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⑥而作为总统府顾问的严复广阅中外报刊，是知道一些内情的。英、法、俄、意在华利益上是打击德国，还是遏制日本，报刊对此多有揣测。1915年8月5日，严复说：“盖英、法、俄、意亦深知复德之难，然皆以必复之为目的。由此而言，何时终局与终局时何等景象，虽眼光极远之家，亦不敢妄下断语也。假令两系之中，必有一仆，以高明策之，究竟何系为耐久乎？知此则不必随俗于报纸为议论矣。”^⑦可见，舆论之分歧，令国人无所适从。

面对报界的语多分歧、众声喧哗，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加强了舆论控制。“民国四年十二月，洪宪帝制行将发表，政府对于在京民党中人异常注意。某日统率办事处接到匿名报告云‘杭辛斋组织谋乱机关，即日起事’等语，该处立派军警多名，往杭斋搜捕。”后将乘车返寓的杭辛斋抓捕。袁世凯迫害报刊报人的事例比比皆是。仇亮，“湖南人。少以文学著称，与唐才常、宁调元齐名，号为‘湘南三学士’”，留学日本期间，与汪精卫等主撰《民报》。辛亥革命期间，他积极策动湖南响应。“南北统一告成，亮偕其同志来京，组织《民主报》馆，自任总编辑。对于袁世凯专制政策，口诛笔伐，不遗余力，袁由是深恶之。癸亥之役，民党失败，《民主报》随亦被封。”^⑧1915年仇亮被逮捕入狱，后被执

① 居正：《揭破袁世凯与日本交涉之黑幕》，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第253页。

②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二），王栻主编《严复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1页。

③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四），王栻主编《严复集》（三），第624页。

④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三），王栻主编《严复集》（三），第622页。

⑤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373~374页。

⑥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375页。

⑦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五），王栻主编《严复集》（三），第626页。

⑧ 王建中：《洪宪惨史》，第9页、5页、6页。

行死刑。而袁世凯迫害报人、报业,也激起新闻界的反抗。

袁世凯复辟帝制受到上海新闻界具有正义感的报人、报业的抵制,一代报人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称:“民国危在旦夕的时候,上海新闻界特电邀飘萍归国,以加强新闻界力量,加强讨袁斗争。当时上海新闻界是全国舆论的枢纽,所以,飘萍怀着‘新闻救国’的志愿匆匆返国。抵沪后,专为上海《时事新报》工作,并为《时事新报》及《申报》写稿,以其犀利的文字增强反袁战线。”^①袁世凯帝制自为受到《时事新报》等报刊的抵制。实际上,《时事新报》是梁启超等在北京筹资而在上海创办的报刊,反映了上海自由的言论环境中呈现“他者”的北京乃至北京的政治形象。在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过程中,梁启超称:“此间言论极不自由,有力之报皆被贿收,外报亦然(路透电最可厌)。我军机关报惟《时事新报》及《中华新报》两家,皆受压迫,未知命运能有几日。”^②可见,其时《时事新报》确系研究系的机关报。1916年1月29日,梁启超在《致亮侪我兄书》中称:“别有一私情宜奉白者,此间《时事新报》为吾党唯一之言论机关,所关甚巨,前此支持本已极难,自筹安会发生后,本报首登密电,揭其阴谋,伪政府禁销内地,每月更须赔垫二千元以上,今为鼓吹主义起见,凡外邮可通之处,皆分途寄赠各机关,不收报资,所费逾[愈]浩。此间同人皆不名一钱之辈,公所知也。数月以来,勉支此局,力竭声嘶,重以近来派人往各省及外洋游说运动,区区川资,且穷于罗掘,将来外洋虽捐款有得,同人亦觉不欲经手收支,惟一切交富滇,听军政府调拨而已。”^③资金来源关系报刊的生存,非常重要,而近代政论报刊多远离商业运作,常与军政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梁启超与蔡锷师生二人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上一文一武,暗中

配合。梁启超以《时事新报》“同人”名义称:“筹安会起,各方面劝进文电,污我报界洁白之纸者累累相望,我同业盖莫不含愤,而未有以破之也。本报得洪宪政府指授机宜伪造民意之密电数十通,急发表之而为之疏证其真相,天下憬然。然发表未及半,本报已被命停止邮寄,不能有片纸出租界外。本报受此打击,两三年而元气犹不能复。”^④此亦见,报刊一旦触犯当权者的政治利益,受遏制甚至停刊是必然的。其后,《时事新报》受到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的打击,也在情理之中。

袁世凯及其军政利益集团毕竟开了历史的倒车,钳制舆论也无济于事。面对时代前进的洪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6月6日,袁世凯病亡。此后,政坛公开争权夺利。首先,有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之争,后南方原国民党及进步党北上参加国会,南北之争才暂告停。其次,面对欧洲的战局,是否参战有府院之争,这些引发了中外报刊舆论的高度关注。1917年2月18日,严复说:“辰下京中有三大问题:一曰复辟;二曰中德绝交;三曰改组内阁。……至其二问题,鄙人则主张加入协约,曾于《公言报》著论一首,即持此义。但政府抗议后,在中国境内德人极为恐慌,益出死力向各当路游说,政府中人于欧洲兵事向少宣究,易为游言所惑,恐亦不能有贯彻之主张,后此外交将至一无所得,两不讨好,甚可叹也!至于第三问题,则报馆攻者甚众,然亦未闻将现何等事实。”^⑤面对府院之间的争权夺利,严复在安福系喉舌《公言报》上发表政论,其价值取向当与此基本相同。但袁世凯病逝后政治舆论愈加复杂。1917年下半年,严复称:“如今之某总长某次长,华洋各报,坦然攻之,他日事变所趋,真令人不寒而栗耳。”^⑥京师报刊成

① 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文苑撷英》,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68页。

② 梁启超致蔡锷第二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0页。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6页。

④ 时事新报同人:《本报五千号纪念辞》(1921年12月10日),转见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⑤ 严复:《与熊纯如书》(四十九),王杖主编《严复集》(三),第663页。

⑥ 严复:《与熊纯如书》(五十九),王杖主编《严复集》(三),第676页。

为争权夺利的政界工具，“北方诸报，除该系一二机关外，百口同声，群相唾骂”^①。可见报刊舆论的混乱与政治分裂对峙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向上回溯历史，包括府院之争在内的传媒镜像可以视作孙中山为核心的同盟会与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冲突而形成的历史遗产。

四、对近代报刊与政治舞台舆论建制关系的反思

近代中国时值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组织多有变迁，诸如袁世凯幕府演化成袁记军政利益集团乃至北洋军阀，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变成中华革命党等等。其中涉及孙中山及其政敌袁世凯等政治变革中的身份认同，而政治身份认同又与他们所处的政治舞台的空间建构密切相关。报刊无疑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舆论精英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拓展活动空间的重要手段。

首先，传媒是政治表演的合法性论证的重要工具及手段。合法性的重要体现是政治人物在政治舞台上行走及表演背后是否有真实的时代情景，合法性的支撑一是靠军队，一是靠报刊舆论，报刊与军队在维护军政利益集团的利益上往往遥相呼应。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有多重因素，而军事实力无疑是十分关键的。问题有其另外一面，袁世凯在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取代孙中山，并不意味着其政治合法性有军队的支撑就足够，这里涉及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学理论证，报刊舆论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孙中山等所谓“报刊是舆论之母”，与此暗合。从戴季陶代表的革命派舆论与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有不共戴天之仇到《民权报》、《民声报》的论战，《民权报》等虽夹杂有三民主义话语的表述，但更多的是针对对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而媒介对政治利益集团的抹黑或贴金，可能有政治宣传效果，而就社会诚信而言，受伤的往往是大众传媒本身。

其次，传媒虽然不能决定政治舞台表演空间的大小，但往往经营着政治舞台合法性与否的舆论建制。政治行径或表演空间的大小无疑与各军政利益集团手中传媒在政治论战中的锐利程度相关联。在这一点上，袁系报刊面对主动出击的革命利器，无论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论证还是论战中的话语修辞都处劣势。袁世凯自有手腕，刺杀民主政治的偶像宋教仁，对待反对或揭露自己的报人报刊也绝不手软。癸丑报灾后，袁世凯政治舞台空间好像无限扩大，其政治野心也开始无限制地膨胀，竟然复辟帝制。可见，失去媒介监控的政治表演舞台往往听不见反对的声音，为所欲为的政治妄想舞台上得以丑陋地展现。简言之，媒介不仅仅是瓦解政治合法性的锐利武器，也是军事控制下政治合法性建制能持续多久的重要界标。

最后，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能否处于中心位置，不仅仅是军事上短暂的强制力所能决定的。为推翻帝制，孙中山等革命派作了政治让步，袁世凯取得了政权。与此同时，革命者一开始就试图利用媒介为袁世凯的政治演出设置舞台空间，而忽视了媒介当与军事共济才能赢得预期的政治效果。与此对应的是袁世凯重建自己的政治舞台，并制造癸丑报灾，意在扩大自己的政治演出空间，从而为自己的政统奠定合法性，而帝制自为终以有悖民意而至倾覆。可见，脱离军队的媒介政治议程设置，受伤的往往是媒介本身。而政治人物在舞台上表演多久则往往取决于台下观众的“民意”，袁世凯的失败就是注脚。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六十），王栻主编《严复集》（三），第677页。